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海青
编

王 韬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PROJECT

中国近代
思想家文库



海青
编

王
韬
卷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王韬卷/海青编.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300-18381-7

I. ①中… II. ①海… III. ①思想史-研究-中国-近代 ②王韬 (1828~
1897)-思想评论 IV. ①B2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66302 号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王韬卷

海青编

Wangtao Juan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60 mm×230 mm 16 开本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张	24.5 插页 2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05 000	定 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编纂委员会名单

主 任 柳斌杰 纪宝成
副主任 吴尚之 李宝中 李 潞
王 然 贺耀敏 李永强

主 编 戴 逸

副主编 王俊义 耿云志

委 员 王汝丰 刘志琴 许纪霖 杨天石 杨宗元
陈 铮 欧阳哲生 罗志田 夏晓虹 徐 莉
黄兴涛 黄爱平 蔡乐苏 熊月之

(按姓氏笔画排序)

总 序

对于近代的理解，虽不见得所有人都是一致的，但总的说来，对于近代这个词所涵的基本意义，人们还是有共识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走入近代，就意味着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经济取代了以地主经济、领主经济或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中世纪的经济形态，也还意味着，它不再是孤立的或是封闭与半封闭的，而是以某种形式加入到世界总的发展进程。尤其重要的是，它以某种形式的民主制度取代君主专制或其他不同形式的专制制度。中国是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长期历史发展是自成一体的，与外界的交往比较有限，其生产方式的代谢迟缓了一些。如果说，世界的近代是从17世纪开始的，那么中国的近代则是从19世纪中期才开始的。现在国内学界比较一致的认识，是把1840年到1949年视为中国的近代。

中国的近代起始的标志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原来相对封闭的国门被拥有近代种种优势的英帝国以军舰、大炮再加上种种卑鄙的欺诈打开了。从此，中国不情愿地加入到世界秩序中，沦为半殖民地。原来独立的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国家，如今独立已经极大地被限制，大一统也逐渐残缺不全，中央集权因列强的侵夺也不完全名实相符了。后来因太平天国运动，地方军政势力崛起，形成内轻外重的形势，也使中央集权被弱化。经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以及辛亥革命后的多次内外战争，直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致使中国的经济、政治、教育、文化，都无法顺利走上近代发展的轨道。古今之间，新旧之间，中外之间，混杂、矛盾、冲突。总之，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既未能成为近代国家，更不能维持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外患内忧咄咄逼人，人们都有某种程度“国将不国”的忧虑。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读书明理的士大夫，或今所谓知识分子，

尤为敏感，在空前的危机与挑战面前，皆思有所献替。于是发生种种救亡图存的思想与主张。有的从所能见及的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中借鉴某些东西，形成自己的改革方案；有的从历史回忆中拾取某些智慧，形成某种民族复兴的设想；有的则力图把西方的和中国所固有的一些东西加以调和或结合，形成某种救亡图强的主张。这些方案、设想、主张，从世界上“最先进的”，到“最落后的”，几乎样样都有。就提出这些方案、设想、主张者的初衷而言，绝大多数都含着几分救国的意愿。其先进与落后，是否可行，能否成功，尽可充分讨论，但可不必过为诛心之论。显而易见，既然救国的问题最为紧迫，人们所心营目注者自然是种种与救国的方案直接相关的思想学说，而作为产生这些学说的更基础性的理论，及其他各种知识、思想，则关注者少。

围绕着救国、强国的大议题，知识精英们参考世界上种种思想学说，加以研究、选择，认为其中比较适用的思想学说，拿来向国人宣传，并赢得一部分人的认可。于是互相推引，互相激励，更加发挥，演而成潮。在近代中国，曾经得到比较广泛的传播的思想学说，或者够得上思潮的，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进化论。近代西方思想较早被引介到中国，而又发生绝大影响的，要属进化论。中国人逐渐相信，进化是宇宙之铁则，不进化就必遭淘汰。以此思想警醒国人，颇曾有助于振作民族精神。但随后不久，社会达尔文主义伴随而来，不免发生一些负面的影响。人们对进化的了解，也存在某些片面性，有时把进化理解为一条简单的直线。辩证法思想帮助人们形成内容更丰富和更加符合实际的发展观念，减少或避免片面性的进化观念的某些负面影响。

（二）民族主义。中国古代的民族主义思想，其核心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最重“华夷之辨”。鸦片战争前后一段时期，中国人的民族思想，大体仍是如此。后来渐渐认识到“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但当时中国正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和掠夺，追求民族独立是民族主义之第一义。20世纪初，中国知识精英开始有了“中华民族”的概念。于是，渐渐形成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核心的近代民族主义。结束清朝君主专制，创立中华民国，是这一思想的初步实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加入“协约国”，第一次以主动的姿态参与世界事务，接着俄国十月革命爆发，这两件事对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造成绝大影响。同时也将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提升

到一个新的层次，即与国际主义（或世界主义）发生紧密联系。也可以说，中国人更加自觉地用世界的眼光来观察中国的问题。新生的中国共产党和改组后的国民党都是如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的知识精英用来应对近代中国所面临的种种危机和种种挑战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武器。

（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模糊的理想是早在古代就有的，而且不论东方和西方都曾有过。但作为近代思潮，它是于19世纪在批判近代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产生的。起初仍带有空想的性质，直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创立起科学社会主义。20世纪初期，社会主义开始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播者不太了解科学社会主义与以往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本质区别。有一部分人，明显地受到无政府主义的强烈影响，更远离科学社会主义。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之后，中国人始较严格地引介、宣传科学社会主义。但有一段时间，无政府主义仍是一股很大的思想潮流。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从思想上说，是战胜无政府主义的结果。中国共产党把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此后，社会主义者，多次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者进行论争并不断克服种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

（四）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也是从清末就被介绍到中国来，只是信从者一直寥寥。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具有欧美教育背景的知识精英的数量渐渐多起来，自由主义始渐渐形成一股思想潮流。自由主义强调个性解放、意志自由和自己承担责任，在政治上反对一切专制主义。在中国的社会条件下，自由主义缺乏社会基础。在政治激烈动荡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很难凝聚成一股有组织的力量；在稍稍平和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多沉浸在自己的专业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自由主义不曾有，也不可能有很大的作为。

（五）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处于转型期的社会，旧的东西尚未完全退出舞台，新的东西也还未能巩固地树立起来，新旧冲突往往要持续很长的时间，有时甚至达到很激烈的程度。凡助推新东西成长的，人们便视为进步的；凡帮助旧东西排斥新东西的，人们便视为保守的。其实，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应是进步主义；与顽固主义相对的则应是激进主义。不过在通常话语环境中人们不太严格加以区分。中国历史悠久，特别是君主专制制度持续两千余年，旧东西积累异常丰富，社会转型极其不易。而世界的发展却进步甚速。中国的一部分精英分子往往特别急切地想改造中国社会，总想找出最厉害的手段，选一条最捷径的路，以

最快的速度实现全盘改造。这类思想、主张及其采取的行动，皆属激进主义。在中共党史上，它表现为“左”倾或极左的机会主义。从极端的激进主义到极端的顽固主义，中间有着各种程度的进步与保守的流派。社会的稳定，或社会和平改革的成功，都依赖有一个实力雄厚的中间力量。但因种种原因，中国社会的中间力量一直未能成长到足够的程度。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以及激进主义与顽固主义，不断进行斗争，而实际所获进步不大。

(六) 革命与和平改革。中国近代史上，革命运动与和平改革运动交替进行，有时又是平行发展。两者的宗旨都是为改变原有的君主专制制度而代之以某种形式的近代民主制度。有很长一个时期，有两种错误的观念，一是把革命理解为仅仅是指以暴力取得政权的行动，二是与此相关联，把暴力革命与和平改革对立起来，认为革命是推动历史进步的，而改革是维护旧有统治秩序的。这两种论调既无理论根据，也不合历史实际。凡是有助于改变君主专制制度的探索，无论暴力的或和平的改革都是应予肯定的。

中国近代揭幕之时，西方列强正在疯狂地侵略与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中国是它们互相争夺的最后一块、也是最大的资源地。而这时的中国，沿袭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已到了奄奄一息的末日，统治当局腐朽无能，对外不足以御侮，对内不足以言治，其统治的合法性和统治的能力均招致怀疑。革命运动与改革的呼声，以及自发的民变接连不断。国家、民族的命运真的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危机极端紧迫。先觉分子救国之心切，每遇稍具新意义的思想学说便急不可待地学习引介。于是西方思想学说纷纷涌进中国，各阶层、各领域，凡能读书读报者，受其影响，各依其家庭、职业、教育之不同背景而选择自以为不错的一种，接受之，信仰之，传播之。于是西方几百年里相继风行的思想学说，在短时期内纷纷涌进中国。在清末最后的十几年里是这样，五四时期在较高的水准上重复出现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直接造成两个重要的历史现象：一个是中国社会的实际代谢过程（亦即社会转型过程）相对迟缓，而思想的代谢过程却来得格外神速。另一个是在西方原是差不多三百年的历史中渐次出现的各种思想学说，集中在几年或十几年的时间里狂泻而来，人们不及深入研究、审慎抉择，便匆忙引介、传播，引介者、传播者、听闻者，都难免有些消化不良。其实，这种情况在清末，在五四时期，都已有人觉察。我们现

在指出这些问题并非苛求前人，而是要引为教训。

同时我们也看到，中国近代思想无比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呈现出绚丽多彩的姿态，各种思想持续不断地展开论争，这又构成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个突出特点。有些论争为我们留下了非常丰富的思想资料，如兴洋务与反洋务之争，变法与反变法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共和与立宪之争，东西文化之争，文言与白话之争，新旧伦理之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社会史的论争，人权与约法之争，全盘西化与本位文化之争，民主与独裁之争，等等。这些争论都不同程度地关联着一直影响甚至困扰着中国人的几个核心问题，即所谓中西问题、古今问题与心物关系问题。

中国近代思想的光谱虽比较齐全，但各种思想的存在状态及其影响力是很不平衡的。有些思想信从者多，言论著作亦多，且略成系统；有些可能只有很少的人做过介绍或略加研究；有的还可能因种种原因，只存在私人载记中，当时未及面世。然这些思想，其中有很多并不因时间久远而失去其价值。因为就总的情况说，我们还没有完成社会的近代转型，所以先贤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在今天对我们仍有参考借鉴的价值。我们编辑这套《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希望尽可能全面地、系统地整理出近代中国思想家的思想成果，一则借以保存这份珍贵遗产，再则为研究思想史提供方便，三则为有心于中国思想文化建设者提供参考借鉴的便利。

考虑到中国近代思想的上述诸特点，我们编辑本《文库》时，对于思想家不取太严格的界定，凡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有其独立思考、提出特别见解和主张者，都尽量收入。虽然其中有些主张与表述有时代和个人的局限，但为反映近代思想发展的轨迹，以供今人参考，我们亦保留其原貌。所以本《文库》实为“中国近代思想集成”。

本《文库》入选的思想家，主要是活跃在1840年至1949年之间的思想人物。但中共领袖人物，因有较为丰富的研究著述，本《文库》则未收入。

编辑如此规模的《文库》，对象范围的确定，材料的搜集，版本的比勘，体例的斟酌，在在皆非易事。限于我们的水平，容有瑕隙，敬请方家指正。

导言

王韬的多面人生

王韬，1828年（道光八年）11月10日（十月初四）生于苏州府长洲县甫里村，初名利宾，又名畹，学名翰，号兰卿。因上书太平军，被清廷缉捕，逃遁香港后改名韬，字仲弢、紫诠，号天南遁叟。其父王昌桂，字肯堂，著籍学官，长期在家乡设馆授徒，邃于经学，王韬九岁即随父馆于本村施氏书塾，遍读群经，旁涉诸史、杂说，奠定了一生学业之基。十五岁就读于新阳县贡生顾惺开设的青萝山馆，十九岁金陵考试落第后即无意仕途，一度仿效其父，以塾馆授徒为业。王韬一生的转折点发生于21岁时的第一次上海之行。那年他赴上海省亲，时其父名为在上海延续开馆生涯，实则暗自协助传教士翻译西书，通过父亲的关系，他得以参观英国伦敦会开设的墨海书馆，对活字版机器快速印刷的高效率留下深刻印象。1849年，王昌桂突然病故，家道中落后的王韬不得不再赴上海谋生，从此就和这个中国最繁华的大都会结下了终身不解之缘。

王韬入墨海书馆的主要工作是协助麦都思翻译《新约圣经》，旧本《新约》翻译均出自传教士之手，最早的中文译本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和米怜维琳合译，第二个译本则出自麦都思与德籍传教士郭士立之手，但此两个版本的中文表述均不够典雅规训，而由王韬润色编辑的改正本《新约》出版后却广受好评，到1859年已印行了11版，直到20世纪20年代仍在中国教徒中普遍使用。《新约》移译的成功使得王韬的译述生涯获得了一个良好的开端，随后由伟烈亚力口译、王韬笔述的《重学浅

说》、《华英通商事略》、《西国天学源流》各一卷相继出版。王韬又与艾约瑟合作译编《格致新学提纲》和《光学图说》等著作，同时协助艾约瑟和伟烈亚力编辑《中西通书》，这部历书性质的小册子，是一本每年以中西日历为主，附带介绍中西政治社会和科学文化的知识普及读物，王韬负责中西日历这部分的编审工作。在《中西通书》序言里，王韬批评“中法每不如西法之密，何哉？盖用心不专，率皆墨守成法，未能推陈出新”，颇能点破国人治学粗疏之弊。

王韬不仅协助传教士直接从西书中移译经典，还与友人合编或亲自编译介绍西方情况的各类书籍，拓展国人认知世界的视野。如与黄胜编译《火器略说》，介绍西方军事技术的基本原理。他自己认为这部书可作营弁施放枪炮的教材，相当简易实用。1881年，驻节福州的方铭山观察一人就买了二百本，令军中兵士习学操演，这也稍稍满足了王韬长期压抑在心底的怀才不遇的经世愿望。再如对西方历史的译述也是王韬著译生涯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译述的《普法战记》、《法国志略》、《西古史》、《西史凡》等均对西国史事有自己独到的心得，特别是《普法战记》一书曾风靡日本，直接促成了王韬的东瀛之行。

王韬的一生始终在中西文化的夹缝中寻求生存之道，其言行轨迹既拥有传统士人风流儒雅的一面，又因长期浸淫于西学而拥有豁达开明的胸怀，对中西双向的文化源流均能采持衡汲取、疏而不离的态度。他交往的友人圈子也多奇言异行之士，颇不符时俗对传统士人的想象。比较著名的就有李善兰和蒋敦复。李善兰是算学名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教育体制的叛逆者。蒋敦复时称江南才子，以诗文称誉于世，其言行却诡异多变，不但曾进寺庙修行，也吸食鸦片，他一方面熟谙英国历史，曾入墨海书馆协助慕维廉译编《大英国志》，另一方面又撰文大骂基督教，活脱脱一个名士风范。王韬曾与李善兰、蒋敦复等好友一起浪迹花丛，时做狎邪之游，人称“三异民”。王韬的另一个好友龚橙乃龚自珍之子，龚橙表面上是个世家子弟，藏书之富号称甲于江浙，且多为《四库》未收之书。龚橙也是性格怪异，放浪不羁，喜好研读满洲蒙古文字，还没日没夜地吟咏梵诗，“且与色目人游戏征逐”，但坊间又传说他1860年为威妥玛和英国远征军引路，甚至曾暗示导引英人焚毁圆明园，气节为人诟病。王韬说他“轻世肆志，白眼视时流……世人亦畏而恶之，目为怪物”，最终发狂病而死。在王韬交往的少数官员中，也有知己式的人物，如曾任江苏巡抚的徐有壬，精于历算之学，经王韬介绍

至墨海书馆参观，得识慕维廉、韦廉臣等教士，王韬还曾三次上书徐有壬，纵论“防海”、“弭盗”、“通商”之大计。徐有壬回信予以褒奖，赐以吕宋银三十饼作为养母之用。

王韬言行之“奇”还表现在他逃匿香港后，协助理雅各把《尚书》、《春秋左传》、《诗经》、《礼记》等中国经典译成英文，开启了中西经典“对译”的新篇章，其自身也成为中国同时参与中西经典互译的第一人。

在港期间，王韬还创办了《循环日报》，发表大量时论，其中《论各省会或宜设新报馆》、《论日报渐行于中土》、《论中国自设西文日报之利》等文，均言及日报对新闻信息传播之功用。1884年，王韬自香港返回上海后，即被聘为《万国公报》特约撰稿人和《申报》的编纂主任，并自办弢园书局，继续在舆论界产生影响。王韬还出任新设格致书院山长一职，格致书院延请中西教师课读，自西国语言文字之外，授以格致、机器、象纬、舆图、制造、建筑、电气、化学等课程，均偏于实用之学，其规制迥异于传统的书院体制，每年分四季为课期，由王韬请于地方官员，出题课士，视其优劣，评定甲乙。列前茅者例拨经费予以奖励。^① 书院教学内容也多有更新，如英国教士傅兰雅每周六晚上进行幻灯教学，亲自编辑《格致新编》供学生阅读。王韬还主持有奖征文比赛，获奖论文汇编成《格致书院课艺》一书以广流传。^②

二

王韬作为非典型意义上的中国文人，长期游走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其活动空间也主要集中于现代大都市如上海、香港之中，自然与乡间士绅的见识有异。柯文称其游动轨迹为香港—上海走廊，与王韬生活于同一时代的一批中国知识人，都有和王韬相类似的经历和世界观念，如何启、唐景星、伍廷芳、马建忠、马相伯等人，这个群体往往被称为沿海最早的思想启蒙者。^③ 他们之间常常相互援引渗透，张开的是一张奇特的交游网络。王韬作为其中的一员，和他们的观念互有交集但又颇具差

^① 参见王韬：《格致书院课艺序言》。

^② 参见张志春编著：《王韬年谱》，16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

^③ 参见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雷颐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异。这批人自幼生长在西学影响浓厚的背景中，受到教会教育的浸染过深，缺少对中国经典的训练和领悟，而王韬所受的教育则恰好兼备旧学熏陶与西学视野，具备一种复杂的双重认同特征，身处夹缝中的独特阅历也使他的言行不时露出自相冲突与犹疑杂糅的特质。

王韬一生从事过的职业种类十分庞杂，曾经拥有编辑、译者、报人、出版商和通俗小说作家等数重身份。除参与编纂大量的中西“对译”著述外，他的政论一般都发表在香港《循环日报》上，一般所称的“洋务”言论和大量涉及时政的议论也统一汇编进《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和《续钞》之中。加上其他各类著述，总数多达36种。由于其对中外政局变化的分析，王韬常常被视为中国近代变革思想的先驱，但他的变革论往往呈现出一种新旧杂糅的特色。如在《禁游民》这篇文章中，王韬提出的建议包括鉴于官、士、医、僧道游堕无根，应该设法把他们驱赶回“四民”的行列，这只是一种古老治术的思路，谈不上与现代变革有什么关系。又如他谈及废科举、废时文的主张也多为前人屡次提及，似乎未见新意。但是，如果把这些言论串接起来，置于清朝当时危机频现的语境中观察，即可凸显其先驱的意义。比如他认为“今国家之予士也，取之太多，简之太骤，人人皆可为士”，导致“民”与“士”身份难分，故考试取士，亦当减其额，远其期，减慢考试频率和录取人数，在当时应是明智之见，即使放在今天也有警示意义。

与一般从事举业的士子所走的人生路途相对平缓不同，王韬一生经历奇诡多变，从一名乡间正统儒士转变成为洋人佣书的雇员，难免会承受舆论的巨大压力。如他曾自嘲说：“今人得温饱便不识名节为何物，可嗤可惜。我今亦蹈此辙，能不令人訾我短耶？”其佣书的身份甚至到了“物议沸腾，难以置喙”^①的地步。他虽深浸于儒术，却又未以此为谋生之本，虽有经世之志，却终生未有机会踏上践履之途，故其思想与行为始终是脱节的，表现出一种驳杂含混的气质。

同时，王韬拥有的复杂身份却又使其拥有远高于普通儒生的双重视野，在传统与现代观念之间纵横游弋，时发警语奇论。即使对于炙手可热的洋务人才，王韬也加以针砭，如说：“须知稔悉洋务者，未必皆通西国语言文字之人，是在能逆探其情耳。迩来之知西学者，类多娇矜自

^① 张志春编著：《王韬年谱》，24页。

负，其料事粗而疏，其观事轻而易。未得西国之所长，而偏陷溺于西国之所短。一旦任之以事，未有不愆者也。”^① 语气中透着自信。

王韬游弋于传统与现代的双重身份，亦使他在观念择取上始终抱持一种微妙的均衡态度。他既不是如腐儒一般素拘于僵化守旧的立场，亦非一味专发愤激之辞博取关注。如在《原道》、《原学》、《原才》这类属于旧体裁的文论中，其议论多不出传统经世的话题范围，如认为人伦乃是“道”承载的真义，“道”是本义，而“器”只是“道”的工具。“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火轮舟车皆所以载道而行者也。”他同时又认为，东西圣人在探究“理”的方面是相通趋同的，所谓“盖人心之所向，即天理之所示，必有人焉，融会贯通而使之同”。不过其结论却是泰西诸国挟以凌辱我中国者，中国圣人皆已“烛照于胸”，甚至认为犹太史书都是由东而西传递过去的，所以中国当为西土文教之先声，这不由让人想起“西学中源说”这类流行的陈词滥调，其中多少透露出意淫的味道。

针对以上诸论，我们也可换个思路加以理解，晚清张之洞提出保存国体，并以之为本，通过引进西方器技之学以固本正源的主张，实与王韬的思路相近。如果不做苛求的话，王韬的“体”、“用”论已经初步具备了晚清“中体西用论”的雏形，据此推测说王韬的“道器之辩”是晚清体用论的先声似不为过。

王韬年轻时即遭逢太平军起事和咸同清廷启动变革转轨计划，他是最早倡导洋务的思想者之一，但其抒发言论的价值恰恰不在流俗意义上的倡导西学，而在于他对盲目倡导洋务的批评，如他有如下议论：“今沿海各直省皆设有专局，制枪炮，造舟舰，遴选幼童出洋肄业。自其外观之，非不庞洪彪炳，然惜其尚袭皮毛，有其名而鲜其实也。”^② 解决此弊端的方案是，先治民再治兵，总纲领则是储材，所谓：“诚以有形之仿效，固不如无形之鼓舞也。局厂之炉锤，固不如人心之机器也。”^③ 也就是说，“器变”只是更新其表，内变须在人心。欲变人心，须知沟通上下之情才是关键。这就涉及“制度变革”这一核心问题了。

王韬对政治体制变革的表述是先得民心，并把“开矿筑路，行轮

① 王韬：《菽园尺牍续钞·呈郑玉轩观察》。

②③ 王韬：《菽园文录外编·变法》。

车，设机器”视为与民共其利而代为之经营的事业。治民的要诀在于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从经济层面上讲，就是一定要让民众分享到政府的利益，而不能仅仅让少数人加以垄断。比如应该在开掘煤铁五金矿藏时，允许民间自立公司，“计分征抽而不使官吏从中掣肘”，制造机器，修筑铁路轮船，官民出资，贫民殫力，达到利益均沾的目的。朝廷有大兴作、大政治，也必须让民众预先知道，也就是说政治运作一定要透明，才能达到君与民共治天下之意。要保证政治透明，达到沟通上下之情的效果，就需要在政治体制变革上有所抉择。王韬在介绍西方政治体制类型时，认为大致可分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和“君民共主”之国三种选择。前两种各有利弊，因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对君主个人的品性要求太高，一般朝代难以企及。民为主，则会造成“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的局面。只有“君民共治”这条路能做到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颇能体现出“三代以上之遗意”，也可与中国古代的清明政治接轨。在基层官员的设置上，王韬也强调依凭民间的塾、庠、校等机构监督官员的言行，使得“上无私政，则下无私议”，官员受到震慑，不敢轻拂民意，以免身家不保，这强调的仍是复三代的古风。

从表面上看，王韬的言论像个复古的冬烘，很跟不上形势，其实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比如他很赞美英国的议会政治，把它视为君民上下互相联络的典范制度。^①他说“英国之所恃者，在上下之情通，君民之分亲”，同样得出了有“三代”遗意的结论。他特别提到“国家有大事，则集议于上下议院，必众论金同，然后举行。如有军旅之政，则必遍询于国中，众欲战则战，众欲止则止。故兵非妄动，而众心成城也”^②。与之相比，“中国则不然，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

在王韬的著作中，有数处提到议会的功能，虽然不像郑观应那样曾专门讨论议会的具体运作程序，但仍充分肯定了议会在政治机构中所起的枢纽作用。如他认为有议会政治，“故内则无苛虐残酷之为，外则有捍卫保持之谊，常则尽懋迁经营之力，变则竭急公赴义之忧”^③。于是把这套政治运作提升到了中国欲谋富强不必别求他术的高度加以认知，

① 参见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

②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纪英国政治》。

③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达民情》。

其评点虽有失简括，却也不失为政治改革的警世之言。

王韬观点之新奇复杂的一面还表现在其无论是在宗教信仰还是在政治立场上都时常处于左右摇摆的境地，几无定见可寻。他时出激讷之论，时又呈泥古之态。如王韬在墨海书馆为传教士佣书时即已受洗入教，虽然他在各类文献中均讳言此事，却毕竟有确凿证据证明其教徒身份的真实性。也许其忌惮此举触及士人的伦常道统，生怕沦为异类而遭诟病。可是就其自身而言却始终没有表露出恪守信仰的心迹，反而在给地方官员的上书中直指耶稣新教与天主教“二者皆足为人心风俗之大害”^①，甚至给清廷出谋划策，以编纂教民户册、赐以匾额、异其服色的手段禁绝耶教异端的传播，或在各处以宣讲圣谕善书为名对抗耶教的流行，以维系传统风教之根基。这类行径似乎不仅越出了基督教徒所应恪守的戒律，而且更像是个异教徒的所作所为。由此举动很难判断其信仰动机的真确性。

王韬也曾在太平军和清廷两方阵营之间摇摆不定，一度给人以首鼠两端的印象。他一方面献计地方官，为诱杀太平军不惜嫁祸民众，他拟订的办法是选择团练头目假扮成百姓向太平军献物，然后设伏聚歼，以后即使有投贼献物之人，也必蒙疑忌而遭杀害，这样民众就不会投奔太平军，最终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齐心协力，杀贼保境，虽死不怨。^②可随后王韬又以黄畹之化名上书太平天国苏福省民务官刘肇钧，为太平军攻占上海出谋划策，时人即戏称他为“长毛状元”。如此纵横捭阖，两面献词，真给后人解释其行为动机陡增难度。唯一可以成立的解释可能是王韬始终没有放弃传统士人的经世抱负，为达此目标不惜两面斡旋，变通行事，耶教信仰不过是应时点缀的工具而已，无法彻底根植于心，成为规范其人生的言行基石。这种经世之志远大于宗教信仰力量的情形曾经频繁发生于时代转型的士人当中。王韬对身处此境也是牢骚满腹，如他云：“世之名公巨卿，未尝不知韬也，然未肯劳其一手足之力，以拔之泥涂者，将俟其哀号迫切而拯之乎？抑或竟听其沦落终身也？”因此他自认用世之志日趋淡漠，故自嘲说：“然则韬虽欲出而用世，其何能为？不如以著述自见，托之空言，传之后世。圣人有作，必验吾言。”^③ 这又属无奈的感叹了。

① 王韬：《菽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

② 参见王韬：《菽园尺牍·续陈管见十条》。

③ 王韬：《菽园尺牍·与邹梦南观察》。

三

王韬在以往的研究谱系中往往被作为接受西学思想的标志性人物加以定位，其时论和译书生涯也是被反复聚焦讨论的热点。目前已出版的王韬文论选集也多注重收录这方面的文章。其实王韬的一生经历相当丰富多样，他个性张扬不羁，经年冶游欢场，纵情声色。《淞隐漫录》文思自由，想象丰富，写妖异梦境、外国美人，皆有声有色，更有《花国剧谈》，搜罗近日之娇娃，采辑四方之名妓，编为《艳史丛谈》之一。他表示要传承唐代《教坊记》、《北里志》的猎艳传统，“纪丽品，摭艳谈”，称“美质良才，岂以古今殊，南北限”。《海陬冶游录》更声称乃一时游戏之作。揽读此书可于“沪上三十年来南部烟花，北里风月，略见一斑”。对此种猎艳之作及私人生活一面，学界向来避忌免谈，或偶然逢此段落，必板起道学家面孔，直接冠以“低级趣味”之恶评。实际上王韬的这一面是当时新旧知识人所拥有的常态，把这部分从其人生经历中硬性切割出去，或粗暴地贬之以道德批判的严辞，实无助于理解王韬的复杂人生际遇。^①

王韬对此不是没有自我意识，在给傅兰雅的一封信中，他坦陈自己的行为早已为时论所不容，自述说：“韬生平所好，在驰马春郊，征歌别墅，看花曲院，载酒旗亭。”“窃以为此特风流游戏之事，本无庸讳之于人前，深恐执事不察，或有以小节进言者，则韬固不任受也。……彼迂腐者流，韬方欲避道而趋，当亦非执事之所喜也。”^② 王韬的经历也颇可验证此言不虚，在青萝山馆跟随顾惺读经时，王韬就开始与顾惺的女儿谈恋爱。他与顾惺女儿顾慧英、女友曹素雯等夏日在唐代诗人陆龟蒙隐居遗址斗鸭池中观荷斗鸭，在池心清风亭成立诗社，集裙屐之雅流，开壶觞之胜会。^③

他十五岁与某女早恋，与之共读《牡丹亭》、《西厢记》，有“人在西风正惆怅，又吹落叶上阑干”之诗句。十九岁的王韬于金陵应试时，即始作狎邪之游，与文漪楼两妓女任素琴、缪爱香来往甚密，荡

① 参见王尔敏：《王韬生活的另一面——风流至性》，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4期上册（1995年6月）。

② 王韬：《菉园尺牍·与英国傅兰雅学士》。

③ 陈尚凡等校点：《漫游随录·野沼观荷》，45~46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